

**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 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 by van der Loon, Piet. London, Ithaca Press, 1984. 189p.

李豐楙 政治大學中文系

中國典籍史上，道教的「道藏」，卷帙宏富，號稱足以與儒家經解、佛教大藏相埒，同屬搜羅各家一切經的大叢書。但如論其研究成果，則道藏的鑽研，却遠在儒、釋二大經藏之後。三者之中，採用現代人的治學方法加以深入的探討，道教學的起步最晚，研究成員也較少，因而它仍屬一尙待大力開拓的園地。近年來國外漢學界逐漸形成道教學研究的風尚，尤其對於道藏本身所作的基礎研究，漸有成就，今年新出版的道教學研究，龍彼得先生（Piet van der Loon）的宋代收藏道書考（*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項研究成果。

宋代收藏道書考列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論叢之七，倫敦 Ithaca Press 出版。龍彼得先生執教於牛津大學，對於漢學研究早著令譽，尤其版本、目錄之學夙稱專精，這本道書論考正充分表現他在這方面的特長，因而獲致可觀的成績。關於道藏的研究，為道教學的奠基工作，陳國符早年撰寫道藏源流考，實具有發覆之功<sup>1</sup>。而國外漢學界，諸如日本、法國等也進行道教經典的研究，對於道藏形成時期，及其與道派的關係，都有深刻的探討。龍彼得先生是項研究，則另闢蹊徑，採斷代研究的方式專研宋代收藏的道書。在道教研究上，宋朝是目前較少有專論論述的朝代，但無疑的，宋朝道教在道教史上具有承前啓後的關鍵地位：宋以前的道派至此期間已有長足的發展，且漸有頹勢，而激起新道教的勃興。至於道藏的源流，也在宋朝粗具成藏的規模，且正式印刷行世。龍彼得先生本就精研中國目錄學，尤對福州的刻書業、版本具有豐富的學養，因而從傳統史志及私人藏書志入手，爬羅剔抉，整理出一詳實可用的道書目錄，對於今後宋、金、元道教教理史的研究，是一深具意義的事。

1 陳國符的道藏源流考，初版在民國38年7月中華書局發行，其後在52年又出改訂版。道藏源流續考則遲至72年明文書局發行。

龍先生處理宋代收藏道書考一書，凡有兩大部分：前一部分為考證；後一部分為是考的主體，即「宋代館閣及家藏道書綜錄」（下簡稱綜錄）及其相關的資料，如索引之類。這一校輯的工作，並非機械式的排比與抄錄，而是運用衆多卡片歸類，然後精密分析考證之後所得出的結果。他採用兩種分類方式：一以書名為主；再附以人名的索引，均按筆畫為序，頗便翻閱。在考證中，他一再批評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的以作者而不以書名作為列目準則的缺點，這是切合實際的考慮。道教學者都瞭解道書的作者有些是可確定，而更多是無法確定，甚至早已佚失作者之名，所以勢不能完全以作者為列目準據。其「人名索引」，乃以書志所載有作者之名者為據，附錄於後可作為參考之用，則無妨矣。作為書目主體的「綜錄」，事實上已不能按照傳統書志分類，因為那是極為狹窄的、削足適履的方法；但也不能按照道教內部的三洞四輔的七部說，因為道書的增益，實已超出原初三洞四輔的原始構想——晁公武的六部說更有缺陷，縱使運用正統道藏為參考，仍不能妥善處理一些存目的道經，所以採用書名筆畫為序，是目前最適當的分類法。

「綜錄」所據以校輯的書志，至少在十七種以上，對於這些搜羅完備的書志，作者加以詳細的考證，這就是前部分長達六十五頁的論考。其序文中提及二大目標：首需考宋代前後所有書目中的道教書志，使其原始、傳遞及相互關係澄清；其次需要回顧道藏的歷史，這就是論考的二大內容。道教學者對於道藏的研究，大多從道教內部著手，說明三洞四輔的七部說之成因及其意義，間亦注意及歷代道書目。龍先生由於校輯的材料是以宋代書志為主，自然就溯其源流，而從歷代史志的著錄情形加以探討，這是極有意義的事，可以瞭解史家對道書的看法，及其材料運用等問題。也因為這一必需使用的研究觀點，因此轉能從道教外部發現其問題，而與一般道教學者的研究方法異趣。而且一般目錄學者也極少專注於書志中的道書，本書作者却挾其豐富的目錄、版本的知識，對於道書的著錄提出精采的意見。所以這篇論考，無論是作為「綜錄」的準備工作，乃理所當為之事；就是對於中國目錄學、道教經典史，也具有進一步挖掘問題的價值。

對於收藏道書的書志，凡有館閣與家藏二類。館閣藏書目錄，宋以前——即「歷史的先驅」部分，主要討論了七略、七志、隋書經籍志、羣書目錄，另外舊唐書經籍志也在討論之列，但這些書志著錄未列入「綜錄」的資料。這部分的分類觀念及著錄情形，自是宋代書志的前驅，宜先辨析清楚。但主要的檢討對象，自是以綜錄取材的書志為要。作者在此充分運用其目錄學

專長，詳細解說書志的撰成經過，並選擇其最佳的版本與輯本，藉以說明「綜錄」中書目的取捨標準。這是論考中佔了頗多分量的部分——我們附帶建議，龍先生實可寫出另一本更完整的富於批判性的中國目錄學研究的專書，則本論考中即可以附注方式表現，而將其注意力更專注於其他問題。不過，作者考慮的，可能是爲了達成其首一目標，說明書志的源流、衍變及其錯綜複雜的關係，因此也就不厭其詳地詳述各種問題。

在此應將「綜錄」所運用的書志略加介紹：館閣書志重要的凡有十一種：三朝國史、崇文總目、新唐書、兩朝國史、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鄭樵通志、中興館閣書目、四朝國史、中興館閣續書目、中興四朝國史，最後爲宋史。乃以時代先後、成書先後爲序，故便於考知前後遞承的關係。家藏書志，除了討論三種亡佚書目：李淑邯鄲書目、田鎬荆南田氏書目及董道廣川藏書志；主要的凡分四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趙希弁出版郡齋讀書志的「附志」。書中綜括羣志，而又進一步論述道書部分的因襲關係。這些詳實的考證，以簡明扼要的方式表現在書前、後的圖表中。由此可以確知先已吸收接納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的國史藝文志最後滙集於宋史藝文志中。——國史包括三朝國史（太祖、太宗、眞宗）、兩朝國史（眞宗、英宗）、四朝國史（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及中興四朝國史（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其中前三部所著錄者均不相重覆，而僅列出該朝未被著錄的道書；只第四部成一獨立自足的目錄，因而常有相重之處。其實本書的論考，除了要瞭解其相互傳襲關係外，就是要解明同一道書，在相互襲用狀態下重覆出現的情形。而這正是「綜錄」中頗花時間，也極方便使用之處。因它清楚注出不同書日常有相重疊的所在，再取與道藏對照，實有功於道藏研究，可藉以探明道書流傳、佚失的情形。

關於道藏史的研究，也是本書的目標之一，而作者確也解說了一些疑難問題。這一方面的研究，三十年代的陳國符先生初發其覆，奠定了道藏文獻的初基，雖然其後由於政局驟變，而阻擾其研究的繼續深入，無論如何，其開拓之功仍值得表彰。三十年後龍先生的研究，無疑的更深入一層。論考的重點在宋修道藏，兼及明藏與今日所見重刊正統道藏事，凡分四節：一〇一六年（眞宗大中祥符九年）修訂、印刷的版本，一二四四年（元太宗十六年）的重印及其焚毀、重建的道藏，這四大部分集中在幾個修纂道藏的朝代與主持者。

將龍彼得與陳國符所論列的加以比較，即可發現龍先生論考的重要論點

，有耐人思考一處。一爲張君房在道藏史上的地位，需加以重估，本書認爲張君房編纂道藏的角色在任何道教資料中均未突出，而他被朝廷任命的主要任務，也只是受命監修寫本的繕寫工作而已。對於宋藏的監修及其流傳，龍先生的說明可以補充道藏源流考較爲粗略的部分。二爲經板的雕刻，本書強調黃裳在福州二度擔任郡守，並增收稅款，推動雕印，因而徽宗朝有政和和萬壽道藏的完成，這是全藏刊板之始。在印刷史上，道藏的刊刻雖不若佛藏的早受人矚目，但這套大叢書的刊行，終究是一件大事，龍先生長年鑽研版本學，尤對福州刊書事業具有精熟的知識，自然會注意及福州經板的瑣細問題，他從金朝的大金玄都寶藏的刊刻及其卷數，逆推福州經板——即政和和萬壽道藏這七萬版，是一件足供參考的推論。三爲考證元全真派宋德方重刊玄都寶藏的事，他以宋德方墓碑、商挺及元好問所撰宋德方、秦志安碑銘，論證元藏的刊刻，有些說明確較陳國符所說的清楚而連貫。一項有趣的推論，是他從雲笈七籤、太清風露經等殘篇的描述與插圖，推測元刻道藏的版本大小及形式，並旁證以佛教經典的版本，這些知識實有益於正統道藏版本的瞭解，至少可以窺知其前後衍變的情況。四爲元帝的焚經與明代的重建，這是道教史的大事，學者大抵已能勾勒其經過，本書重點則在補充說明經板的刊刻、印行；尤其對於版式、版數，均有合理的推算。

有關道藏的刊刻，對於「綜錄」，雖只提供較深刻的瞭解，但對於道藏源流史是頗有意義的。因爲道藏的刊行是一費時費力的大工作，但有關的資料得以完整保存在書志文獻或道藏之中的，爲數不多，這是從事道藏研究者的一大缺憾。因此想突破研究工作的困境，實在需要從各方面著手，運用新發現的資料，濟之以新方法，綜合歸納，始得彌補資料短缺之憾。龍彼得先生在宋代收藏道書考中所獲致的成果，既是妥善利用新出的碑文、殘篇等資料，補益舊說；又從版本、目錄學的知識，試對宋藏的刊刻、板式加以解說。這些努力對當前道藏源流史的瞭解，無疑是提供了極可參考的新發現，值得吾人注意。

綜合是考的論考與「綜錄」，我們除了介紹龍先生的研究成果，也引發一些值得思索的問題——不是此一道書考本身的問題，而是由之可以再深入思考的問題。因爲龍先生所運用的資料是以史志爲主——正史或受館閣書志影響的家藏書志，因而其中分別部居的觀念，到底代表的是何立場？這一立場又與道教中人的看法有何歧異？凡此均爲饒具趣味的問題，因此下面擬就此略加申述：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正史中的經籍、藝文志，代表的是正統的、館閣的修史立場，顯然是屬於儒家本位的，是考曾以「道家書籍與儒家偏見」為標題，討論范祖禹反對陳景元等道士在秘書省校勘道書一事，除了元祐反動的政治因素外<sup>2</sup>，無疑的，儒家本位的思想是其根本的立場。史志的分別部居溯其原始，自是以漢劉向父子的七略為始，其後發展衍變均以此為模式，其中自有一「尊經」觀念為其前題，經部居於甲部，互千年而未易。道書在此情形下該廁於何部？史家幾乎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將其置於「道家」一類之下，然後酌量小變。依論考所列，七略的諸子中有道家；方技中凡有房中、神僊、及醫經、經方，這裏的「道家」是以哲學的老、莊之學等為主，與後來的「道教」實略有區別，但史志一貫沿用「道家」一詞，西洋學者習以 Taoism 逐譯之——有時為了區別，即以「哲學的道家」（philosophical Taoism）指老子、莊子等；以「宗教的道教」（religious Taoism）指神仙道教。史家只能將其分類括於「道家」一目下，乃是採用廣義的、逐漸擴大其涵意的道家名義，這是因為漢末魏晉勃興的道派中，確有託始於老子的情形，因而道教與道家有密切關係；何況唐朝將老、莊、列等封以尊號，成為道教聖經。史家既要規撫七略以下的目錄成規，又鑒於實際情況，就只能將道書列於道家一類中。范祖禹的奏疏即是傳統儒家的立場，他還能接受「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宮」的事實；「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這是頗具代表性的意見，而史官則較為寬厚，較需承認藝文的事實，因仍需將所謂儒者所不道的道書著錄於目。

不過史家的著錄，顯然並不周備，以較具規模的隋志為例：道家類中大半為評介老子之作，其中實可分作兩派：一為玄理派老學，如王弼注；另一神仙派老學，如顧歡注一類，始近於道教，近代老學研究已可分此二大趨向<sup>3</sup>。因而所列入的只有抱朴子（葛洪撰）、夷夏論（顧歡撰）為道教中人之作。龍先生指出雜傳中有二十七部——應為二十八部或更多<sup>4</sup>。又注意到醫方中有大批資料。其餘零星的尚有之，如地理類列有十洲記；最可注意的是集部附錄的道經說明文字，及類名（經戒、餌服、房中、符錄）及卷數，却不

2 見本書頁10—11。

3 日本藤原高男氏有關老子的系列研究，即以神仙道教派老學為主。

4 見本書頁2，其計算應從列仙傳讚三卷至道學傳二十卷，凡二十七部；但後面列於筆記小說中的周氏冥通記，應列入道書中。

列出書名，這一現象可以作多方面解釋：抄襲七錄的數字等書目，而非親自檢閱全部經籍。但更有可能是史官根本無緣親睹當時已「出世」的道書。道教經典的傳承具有其口傳心授的秘傳性，縱使史官有其館閣秘藏之便，也不一定得窺其全貌，自然無緣著錄。其次史志中的道書無法、也不必求其周備，是因為道教中人已在寶經尊經的觀念下整理其經目，如陸修靜所整理的靈寶經、上清經等經目；更有朝廷支持下的修藏工作，北周通道觀即為此類機構，這些經目也都是極為繁多而複雜的。其實只要整理出六朝古道經或初唐類書性質的道書，自可得知六朝時期的道書目錄，其數目比隋志所列自有差別。由此可知道教內部的書目與史志的不同，唐以下諸帝崇道帝王大力支持修藏，藏中經目是較為完備的，龍先生指出私人修史志，其中能親自閱覽的道書都有較詳細的描述，其餘僅能依前人的書目轉錄。所以十二世紀末，道書雖並非罕見，但也絕非易見其全藏。除了道藏龐大的原因外，道書不輕易外傳實為主因——部分祈福及傑出道士表現其思想的道書除外。

史志的分類，龍先生清楚指出宋以前，大多列於史部雜傳、道家、醫方等，而附錄道經；宋朝史志幾乎多列道家、神仙二類，成為慣例，館閣、家藏大多依照此例，晁公武曾及提的六部——應為七部，他疏忽了太清部或太平部——即是以道藏為對象而說的。將道家、神仙二類的部數、卷數按其時代先後列出表格，則顯出一事實：

	三朝國史	兩朝國史	四朝國史	中興四朝國史	宋	史
道家	43部 250卷	8部15卷	9部32卷	47家 52部 187卷	102部	360卷
神仙	97部 625卷	413部不詳	20部不詳	396家447部1321卷	395部	1223卷

即道家的增加量顯然減低，尤其與隋志道家五六部（標出七八部）、舊唐書道家一〇一部。兩相比較，道家一類的減少，由於老、莊等古注漸有佚失，而合乎子部書標準的道士著作能够列入這一類的也不多；因而其數目自然減少；相對於此神仙類的大幅增加，一方面是道教經典隨著道教史的發展，著作增多；另一方面原本列於雜傳中的仙傳，如洞仙傳、漢武內傳之類，逐漸由於史部觀念的演變而改變，雜傳體、尤其神仙類傳記多改入神仙部。其他各類也有同一歸趨，如十洲記原在地理類，其實是一部神仙道教的宗教性輿圖，自然成為十洲三島的新地理說<sup>5</sup>，運用「神仙」來概括道教書籍，自有

5 參拙撰「十洲傳說的形成及其衍變」刊於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六（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民國72年）。

其簡便之處，因為它是所有書志中的一類而已。只是史家大多以承襲前代書志為主，而且常將不同資料重疊列出，故常顯得零亂而無緒，尤其不以書名而以作者分類，尤易產生弊病。當然，道教內部的七部分類法，六朝時期自有其道教經派的意義；但唐、宋以來新出道經漸多，七部之說實不盡能容納。道藏在宋金元新道教興起之際，多由新道教中人纂修，一仍尊經觀念，以傳統分別部居之法為準據。其實新出道經頗多不易納入此一格套中。比較史志二部說與道藏七部說，將其書目清楚列出，應是頗有啓發性的事。「綜錄」的分類法固為現代人的分類觀念，但作為參考，以深究道藏是極有價值的。

最後該提一件事，就是崇道帝王的修藏，真宗、徽宗等大力整修道藏，固然因為帝王尊崇道教、自神其說，但龍先生指出帝王修藏的管制意義。其中對於摩尼教經設法混淆於經藏中一事，曾一再提及。關於道教與秘密宗教——或使用其他名詞稱呼這些不被朝廷認可的宗教，為中國宗教史、社會史的一大問題，歷代帝王對於「秘密宗教」均採嚴厲的高壓政策，這自然與秘密結社可能為害其統治權的心理壓力有關，道教自被帝王承認之後逐漸成為合法的宗教，宗教性格漸濃，而原先曾具的政治性格逐漸淡化，這些被日本學界稱為「教團道教」（或成立道教、組織道教）的宗教團體，與佛教一樣，唐以下就在「道僧格」的管制下活動，朝廷也將其注意力置於「秘密宗教」——日本有稱為「民衆道教」的。所以道藏的刊刻，固然多成於崇道帝王之手，但在崇奉道教的宗教動機之外，也常有借機管制、控制道經的政治意義，這一點，龍先生也曾在論考中明白指出。至於元帝的焚經，歷代所保存的文獻大多指明佛道爭辯的後果，而其背後實具有複雜的時代背景，野上俊靜博士曾分析此一問題<sup>6</sup>。無疑的，焚經之事對於道藏具有相當大的傷害，本書指出明代編修道藏者就謹慎地不列入一些較引起佛教徒詬訾的道經，這是研究明代道藏闕經要注意的事。

從龍先生這本宋代收藏道書考所校輯的資料及其論述，既方便瞭解宋朝道書的情況，從中也能看出許多有關道書、道藏在中國目錄學上的意義，這是本專著所能引發的多方面作用。因而鄭重推介，相信它對道教學界、目錄學界都是一本珍貴而可用的佳構。

---

6 野上俊靜，遼金の佛教（日本 平樂寺書店 1953）；元史釋老志の研究（日本 朋友書店 1978）。